

新媒体时代下网络环境构建的影响因素分析

王沁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重庆

收稿日期: 2023年9月24日; 录用日期: 2023年11月21日; 发布日期: 2023年11月30日

摘要

在新媒体时代下, 基于网络技术的发展, 各种即时通讯工具不断更新, 并且其所带来的便利也使得人们获取信息的能力得到提高。网络社会具有的虚拟性、自主性和隐蔽性等特点使不同于现实社会, 也使得网络主体比现实社会的伦理主体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伦理问题成为影响社会治理的新课题。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更新, 以网络事件为导火索的社会性问题不断出现, 在一些特殊事件中, 某些个体的举动成为影响社会大众意识和社会现实决断的一个重要因素。文章通过对“二更食堂”所显露的失范行为, 通过“三圈理论”模型对“二更食堂”事件的分析, 从价值、能力、支持三个方面分析网络环境构建的影响因素以及如何构建, 并使“耐克区”面积达到最大, 进而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 促进社会良序发展。

关键词

网络环境, 影响因素, “三圈理论”模型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Network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Media Era

Qin Wang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Received: Sep. 24th, 2023; accepted: Nov. 21st, 2023; published: Nov. 30th, 2023

Abstract

In the new media era,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twork technology, all kinds of instant messaging tools are constantly updated, and the convenience it brings also improves people's ability

to obtain information. The virtual, autonomous and hidde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twork society make it different from the real society, and also make the network subjects have greater uncertainty than the ethical subjects in the real society, and a series of ethical problems caused by this have become a new topic affecting social governance.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updating of network technology, the social problems triggered by network events are constantly appearing, and in some special events, the actions of certain individual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general public and the decision of the social reality. In this paper, we analyse the misbehavior of “Ershang Cafeteria” and the incident of “Ershang Cafeteria” through the model of “Three Circles Theory”, and analyse the influence factor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environment and how to support it from three aspects: value, ability and support. We will analys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and how to construct and maximize the size of the “Nike Zone”, so as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Keywords

Network Environment, Influencing Factors, “Three-Circle Theory” Model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问题提出

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兴起，互联网日益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先导力量，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力推动着社会发展，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军事等领域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信息化、网络化成为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强大动力。

习近平在祝贺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召开的致信中强调[1]，网络文明是新形势下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网络强国的重要领域。近年来我国在互联网建设、网络生态治理方面取得明显成效。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日益增多的自媒体用户正在成为网络空间中的主力军。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如何构建更加安全、更加健康的网络环境，是建设网络强国重要的方面，也是构成网络文明的重要成分。因此，本文主要以微信公众号“二更食堂”为例，来探讨新媒体时代下所存在的网络伦理问题以及应对之策。

2. 文献综述

关于网络伦理失范的应对之策方面，很多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总的来说是从网络主体自身伦理教育、立法执法层面进行监督管理。有的学者就提出要加强对网络主体的伦理道德教育。也有的学者认为应该要加强立法执法的规范建设，从而构建更加完善的法律法规监管体系和机制。比如2014年光明网发表的名为“网络伦理失范及其法律应对”中从伦理道德教育、网络立法、执法等几个方面阐述了网络伦理失范的法律应对之策；又比如2020年5月高文娟在搜狐新闻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从失范的表现以及新媒体迅速发展所带来的挑战等两个方面出发，分析了疫情防控中网络媒体伦理失范现象，并提出解决伦理失范的紧迫性。除此之外，也有学者认为应该从全社会出发，从整体来提升各个主体的伦理素养，以及要联合各方面的力量，比如政府、社会、高校等[2]。

1997年，我国第一篇有关网络伦理的研究是由陆俊、严耕二人合写的《国外网络伦理问题研究综述》，

这篇文章它主要从机构、规范以及教育等方面进行阐释[2]。1998年,国内学者严耕、陆俊、孙伟平三人合作的专著《网络伦理》可以算是对我国网络伦理进行了初步建构[3]。1999年,美国学者理查德·斯皮内洛的《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由刘钢进行翻译并在国内出版。近年来,国内有关这方面研究的著作逐渐增多,比如2019年湖南大学出版社的《国家治理与网络伦理》一书,从偏重“鼠标下的德性”、个人道德上升为国家层面治理,更是对网络伦理研究的进一步完善。并且近几年学者有关网络心理教育等方面的研究也在增多,如2017年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为理论切入点的陈晨,就分析了基于技术视域下的网络开发,并提出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应对之策[4]。2019年杨金丹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在TPB模型的基础上,采用SPSS和Amos软件对大学生的伦理失范行为进行了分析,并对我国当前高效预防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行为发生提供了依据[5]。

在国内目前已有的研究中,学者们针对遇到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随之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网络伦理失范的概念以及现象和成因,并提出不同层面的解决方法。目前,国内学者针对网络伦理研究较全面的是学者徐云峰出版的《网络伦理》一书,该书就概念、网络伦理的成因、表现以及遇到的难题进行阐述,并最后还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网络伦理。

20世纪60年代,随着人们对网络技术的不断探索,互联网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高度,随之而来的黑客、隐私等问题也开始影响到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秩序,这使得人们开始关注网络问题。1985年,第一部关于计算机伦理的书籍《计算机伦理学》正式出版。20世纪末期,出现了许多新的计算机伦理课程、期刊、教程以及与以往研究不同的研究中心等。计算机伦理学的发展速度很快,其重要性很快被学者意识到,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其发展也到了一个更为成熟的阶段。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国外学者也日渐注重对伦理问题的研究,如Yaokumah Winfred在2021年所发表的名为《Development and Psychometric Analysis of Cyber Ethics Instrument》[6]中对网络伦理分析工具进行一个整合。

综合已有的研究,计算机伦理或者互联网伦理其实遍布人们生活日常,但如何去营造一个更为健康的网络环境,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

3. 基于“三圈理论”的网络环境构建因素分析

“三圈理论”是由马克穆尔在其著作 *Creating Public Value: Strategic Management in Public* (《创造公共价值:政府战略管理》)中首次提出。他认为,创造公共价值是公共管理行为的终极目标。决策或战略在执行前,要明确该项行为是否具有公共价值,相关组织是否具备管理或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该决策或战略是否得到全面的支持,进而形成了“三圈理论”。建构了价值、能力和支持三方面为主的三维分析框架,在三圈交叉重合的地方称为“耐克区”。“耐克区”内的决策及行动既契合公共价值,又具备相关能力,以及政策、技术、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是公共管理追求的平衡协调的理想状态,体现了内在价值、能力与外在支持的有机统一[7]。该理论中的三圈并不是静态存在的,而是动态变化的,现实情况复杂多变,各区域的大小是根据现实状况而不断变化的,“耐克区”中各区域大小也不尽相同。

“三圈理论”认为,对价值圈的思量能够使我们的目标更加合理,对能力圈的整理能使我们认清实现目标的主客观条件,对支持圈的完善能够让我们以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式来满足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8]。在网络社会中,网络主体的行为是各种各样的,其对象有可能是模糊的,而当缺乏任何一个圈的时候,必然会发生失范现象,价值、能力以及支持三个要素是相辅相成的,网络主体在做出决策的过程中,当价值标准偏离、识别能力不足、缺乏权威支持时,决策的结果必然会带来较为恶劣的影响。

第一,网络环境构建的价值分析。价值分析关注的重点在于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网络环境的整体构建过程是否以公共价值为目标,是否能够保证公共价值目标的连续性和各层面目标的一致,即充分了解并统一不同主体的价值诉求,坚持公共价值的首要性及根本性[9][10]。在日益多元化的互联网环

境下，人们在享用技术带来的便利时，可能会出现价值偏颇甚至扭曲的现象。

第二，网络环境构建的能力分析。能力分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晴朗化网络环境的构建能力，二是社会多元化主体协调合作的能力，借助各主体自身力量，整合优势资源，充分发挥资源禀赋优势，不断提升能力，为网络环境的构建以及进一步优化提供运转动力，满足整体社会发展的需要。具体体现为各充分发挥自身禀赋优势及准确、即时实施策略，由各主体之间进行相互的能力考评与监督。需要各个部门有较好的解决事件的能力，能较好地对网络环境进行监督管理。

第三，网络环境构建的支持分析。支持分析主要是从社会环境中所获得的支持，包括资源支持、技术支持、信任支持，并协调各主体优势资源整合社会资源并促进其他主体发展以及网络环境的优化，从各主体之间的内部联系以及外部运行环境入手，探索并拓展网络环境构建得到的支持[11]。主要有政府主体提供的政府支持、社会形成的制度规划及一系列文化规范、新兴技术支持三个维度，这些支持以满足社会发展和公众需求为前提(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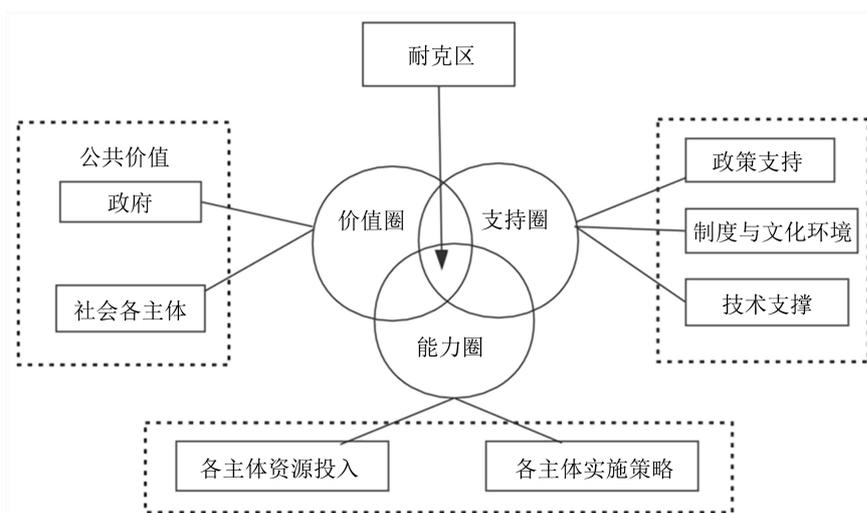


Figure 1.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twork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three-circle theory”

图 1. 基于“三圈理论”的网络环境构建的分析框架

4. 运用“三圈理论”模型分析“二更食堂”

4.1. “二更食堂”概述

“二更食堂”事件主要是在 2018 年滴滴顺风车安全隐患事件的发生，各网络主体在反思安全的同时，也在为受害者惋惜。在自媒体时代，日益涌现的自媒体人让大众看见新媒体领域所具有潜力，越来越多的人都投身入自媒体创业中，而微信公众号“二更食堂”所发布文章对事件进行了不当描述，引发大量用户强烈反感。

评论员刘雪松[12]在中国网的一篇新闻评论稿中提到：“二更食堂”在给读者的致歉信中表示，微信公众号的推文，因为审核流程有缺漏以及严重的表述不当，给广大受众造成了强烈的不适感，也给文章涉及的当事人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实际上是在向读者致歉的同时，也在解释着这场“严重错误”的原因。但在接下来的文字中，以貌似更高的姿态表示，“一切无须辩解，辩解只会让错误变得愈加丑陋；因为我们审核不严谨，而导致文中写下了与我们的初心截然相悖的字句”。毫无疑问，这番逻辑混乱的表态，还真是让“错误变得愈加丑陋”。

《新快报》高级记者黎秋玲[13]提到：“二更食堂”公众号被永久关闭，简单地谴责并不利于整个行业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教训。值得警醒的是，近几年的一系列社会热点事件中，一些自媒体大V和新媒体平台不负责任、唯利是图的传播行为频频出现，不断挑战着公众理性和社会法治，公然煽动网络暴力。有的平台甚至用低俗、侵权的内容“开疆拓土”，掌握用户和流量资源，跻身互联网媒体的“新贵”。梳理、反思此类自媒体报道的不足之处，对此类文章和平台进行约束和规范，有利于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4.2. 基于“三圈理论”模型的二更食堂事件分析

4.2.1. 价值圈分析

网络环境构建机制涉及各主体之间有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公众的价值诉求在于满足自身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利益需求，并通过合法的正式或非正式渠道表达自身对环境参与权利的需求。“三圈理论”模型中的价值圈就是要确保整体脉络中各主体的终极目标。价值圈中各主体有着共同的价值诉求，是以社会价值为目标，始终坚持公共价值的首要性和根本性，充分发挥网络环境构建过程中价值体系内外作用力的最大化。

第一，政府方面。网络环境的构建本身是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征程营造一个更加舒适的环境，保障社会良序运行为目的。作为环境构建的主要主体，政府的诉求必然指向社会价值的实现。在“二更食堂”一例中，事发之后浙江省网信办和杭州市网信办就“二更食堂”发布低俗文章一事，约谈该公众号主要负责人，要求全面清理违规有害信息，严肃处理有关责任人，并限时提交整改报告。政府相关部门对事件的及时回应，一方面为社会价值的实现保驾护航，另一方面也像公众展现力图营造干净网络环境的坚定决心。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目标显然指向公众需求与环境权益，追求社会价值的实现。

第二，社会主体方面。这里的社会主体包括企业、各种社会组织以及网民。社会各主体有他们自己的利益诉求，比如企业本身就具有追求经济利润的特质，网民归根到底也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天性，但尽管如此在面对破坏社会秩序、损害社会价值、违背伦理道德时，社会各主体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当微信公众号“二更食堂”发表的内容呈现出违规信息时，各主体纷纷充当纠察角色，最终确保社会价值的实现。

由此可见，在网络环境构建过程中，各主体在政府这一主要主体的引导下，充分发挥自身作用，确保网络环境的干净，进而确保社会价值的实现。

4.2.2. 能力圈分析

网络环境构建的内在基础是能力的不断提升，在能力圈中各主体要不断发挥自身的力量，充分整合优势资源，依据资源禀赋为网络环境构建创造有利条件并提供运转动力。在网络环境构建过程中，各主体不仅需要独自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能力，还需要各主体具备与其他主体协商合作的能力。政府作为网络环境构建的组织者、引导者、政策法规制定者，不仅要完善自身管理体系、提升管理能力，并且要做好系统筹划，除政府以外的其他的主体，如企业、第三部门以及网民，不仅需要承担具体的实施功能，同时对整个网络环境体系进行监督。

第一，各主体资源共同投入。组织的资源能力是保证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的基础。这里所指的能力包括财力、人力、设施、空间、权力、知识、信息等。针对“二更食堂”所出现的纰漏，直接相关的部门——网信办随即对公众反映的问题进行核实，除此之外，各种规范也相应出台。在政府部门进行一系列整治之后，各自媒体的规范也随之出来，以及一些自发组成的网民团体也随时监督整个网络环境。并且在网络技术的支持下，电子商务也逐渐得到发展，并且很多部门也都开通了官方微博以及公众号等，各方面人才也在不断涌现。

第二，各主体共同行动策略。通过各主体合作，多主体行动，各种渠道的宣传，实现伦理道德切实落到实处。除了相应的法律规范之外，顶层设计也在更加注重“人之常情”的良好处理以及充分发挥其所具有的作用。在“二更食堂”一事出来之后，首先政府部门更加严格处理此类事件，其次关于滴滴打车一系列的安全条例也明显增多，以及各种志愿团队也在逐渐生根。以互联网为平台，各主体在不同的节点分别发挥不同的作用，使整个网络变得更加流畅，进而实现从点到面，从线到片，不断实现更加安全更加优美的网络环境的构建。

4.2.3. 支持圈分析

系统平稳有效的运转，离不开自身高效、稳定且有强大内核运转力的支持，与此同时，其直接接触的生态环境的支持也至关重要，包括政策环境支持、技术环境支持、文化环境支持等。在政策环境支持方面，相关权威部门要确保网络环境构建过程的法律保障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促进相关法律法规出台落实，进而营造合法、稳定、有利的社会环境；在技术环境支持方面，新兴科创单位充分借助有力技术条件，不断技术创新，掌握核心关键技术，使网络环境的构建过程处于新技术全覆盖的过程；在文化环境方面，各组织要完全承担其相应的责任，最大化社会公众的文化传播力度，引导公众的文明行为以及对网络舆论的正向引导，传递正能量，营造良好的氛围。

第一，政策支持。针对网络空间，国家出台了相应的法律法规来确保网络环境的有序运行。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为网络环境如何构建提供了指导思想以及构建目标等等。

目前，有关网络空间及其安全所颁布的政策和法律有：2017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正式实施；《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时间是2017年6月1日；2018年11月1日，公安部发布《公安机关互联网安全监督检查规定》；2017年11月2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以及2021年9月1日所实施的《数据安全法》等。

第二，制度环境和文化支持。在政策支持下，各组织以及个体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与文化环境。制度环境是从规章制度等方面提供支持，比如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实施具有特色的规章制度，使之更加符合健康网络环境的发展；文化环境是从营造适宜的文化氛围方面提供支持，加强伦理道德教育，可以不定期开展网络安全教育活动或者竞赛。

第三，技术支持。网络环境的构建离不开各种数字技术的运用，在逐渐信息化的时代，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不断被应用于现实生活中，这些技术的发展进一步为网络环境的构建提供技术保证。

在现实社会中，有很多失范行为在其他层面都正常的情况下仍可能发生的原因是该种行为正常发生的条件不到位，从而导致正常的社会行动无法展开。以此类推，在网络社会中，同样的也会因为缺乏某些条件而导致失范行为的发生，比如当网络教育不到位时，网民们可能形成不完善的伦理体系，从而在处理事情时出现与正常结果有偏差的现象。再者，我们在利用互联网进行互动时，必须要维护我们所处的环境，要向具有优秀品质的人学习，向身边的人传递正能量，号召全社会成员一起共同维护网络环境，并且各大媒体以及各种属性的机构也要严格规范行为，积极主动地宣传好的行为。相关政府部门应该要向大众定期宣传真善美的行为并以身作则约束自身行为，在面对未经证实的舆论时，我们要做到不信谣、不传谣，为和谐干净的网络环境贡献一份力量，为社会的良序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社会价值执行和目标实现所需的相关能力，以及政策、制度与新兴技术支持，三者的有机统一可实现“耐克区”的最大面积化，使网络环境的深度优化具备了可能性。在三圈模型中，节点上各主体可根据公共价值导向、能力要求，以及外部支持程度去识别构建过程中潜在的问题及风险，并根据问题及时调整策略，使之不断接近平衡良序状态，并且达到对多主体协调合作的理想状态，进而在网络环境构建过程中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

5. 结论

借鉴“三圈理论”的分析框架,以微信公众号“二更食堂”发布的一篇文章为例,从价值、能力、支持三个方面分析网络环境构建过程中存在的失范问题以及如何优化网络环境,并将社会发展纳入分析维度,以验证“三圈理论”模型对于净化网络空间,优化网络环境,完善网络体系的有效性,不断使得“耐克区”面积达到最大。

随着网络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作为与现实世界不同的虚拟空间,网络已经全方面渗入人们的生活中。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已经习惯网络所具有的便利性和快捷性,人们愈来愈重视自己的话语权是否得到重视和保护。与此同时,人们之间的交往模式也在日渐发生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其价值标准、思维模式等也发生变化。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便利迅速的信息,并且愈来愈多的网民正在加入公共管理的大部队,但同时各种网络伦理失范事件的发生频率也在提高,网络失范事件的频发使得网络环境趋于复杂,使得社会治理体系出现漏洞,如何防控和根治伦理失范现象则是新媒体时代下构建有序的网络秩序以及健康的网络环境所面临的一大难题。

网络社会作为现实社会的延伸,其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多元性,使得现实社会中的风险或潜在的威胁以另一种形态在网络社会中出现,这不仅会破坏稳定的网络秩序,甚至会对网民的心理健康造成巨大的伤害。作为网络主体的人是现实存在的,是有感情有血肉的,在网络空间中,人们通过互动、交往,传递和表达彼此的想法,彼此间的价值标准互相影响。在面对网络社会中层出不穷的问题时,首先要明晰网络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如目标、价值观以及愿景之间的关系等;其次,要明确利益相关者层面的目标并为实现目标而制定一系列的举措;最后,为各个层面目标的实现设定考核标准,使网络社会治理更加规范化、标准化。

总之,网络伦理问题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深层次的原因,而网络伦理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各方面力量的配合。网络伦理的规范化只是影响网络环境构建的一个因素,诸如外界环境、技术以及社会认知等都会影响其构建。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致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的信[EB/OL]. 新华社.
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1-11/19/c_1128079505.htm, 2021-11-19.
- [2] 振超, 黄洁. 大数据背景下网络信息的伦理失范、原因及对策[J]. 理论与改革, 2015(2): 172-175.
- [3] 屈文锦, 李玉琴. 中国网络伦理发展研究述评[J].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0, 11(1): 11-22.
- [4] 陈晨. 网络游戏的伦理问题及其对策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广州: 暨南大学, 2017.
- [5] 杨金丹. 大学生网络伦理失范的生成机制研究——基于 TPB 模型的实证分析[J]. 高教探索, 2019(1): 118-123.
- [6] Yaokumah, W. (2021) Development and Psychometric Analysis of Cyber Ethics Instru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 Ethics*, 12, 54-74. <https://doi.org/10.1037/t86196-000>
- [7] 曹俊德. “三圈理论”的核心思想及决策方法论意义[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0(1): 37-41.
- [8] 冯忠亮, 袁品涵, 张林海, 等. 基于“三圈理论”的税务系统离退休干部管理研究[J]. 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8, 31(3): 54-58+66.
- [9] Kelly, G., Muer, S. and Mulgan, G. (2002) *Creating Public Value: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Public Service Reform*. Cabinet Office, UK Government, London.
- [10] 王学军, 张弘. 公共价值的研究路径与前沿问题[J]. 公共管理学报, 2013, 10(2): 126-136+144.
- [11] 朱镇生. 高职教育校企合作难题: 成因与破解——基于三圈理论的视角[J]. 职教论坛, 2016(19): 62-66.
- [12] 二更食堂无底线消费空姐被害事件被封号 被指贩卖“人血馒头”? [EB/OL].
<http://zjnews.china.com.cn/yuanchuan/2018-05-13/141304.html>, 2018-05-13.
- [13] 黎秋玲. 论自媒体平台网络伦理操守[J]. 网络传播, 2018(6): 89-91.